

近代西方列强侵华史丛书

江西高校出版社

福音书与毛瑟枪



陈解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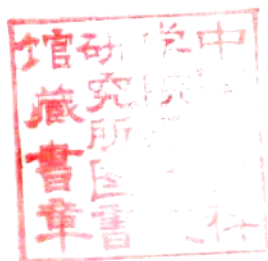


近代西方列强侵华史丛书

江西高校出版社

福音书与毛瑟枪

陈解牛 著



(赣)新登字第007号

书 名：福音书与毛瑟枪

作 者：陈解生

出 版

发 行：江西高校出版社(南昌市洪都北大道16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照 排：江西震华公司照排中心

印 刷：丰城市印制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3.25

字 数：76千

版 次：199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元

ISBN 7—81033—442—5/K·21

邮政编码：330046 电话：8331257、8332093

①江西高校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近代西方列强侵华史丛书》编委会

主编：汪 祖 德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	志	远
王	东	林
刘	晓	明
何	大	进
陈	庆	发
陈	解	生
程	德	林

E61/14

编者的话

中华民族已经走过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历程。在这漫长历史的时空中,中国为世界所仰慕,放射出高度文明的光辉。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备受列强欺凌,陷入了领土被瓜分、主权被强夺、资源财富被劫掠、人民遭奴役的悲惨境地,滑向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深渊。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反对殖民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迎来了民族和国家的新生。

耻辱的历史已经过去,中国与西方大国又开始交往。昔日的仇恨可以消解,但绝对不可遗忘。肩负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我国青少年,要明耻发愤,知史困强,让祖国的古代文明重放异彩,现代化建设再创辉煌。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为青少年朋友所喜爱,而成为你们的良师益友!

一九九四年七月

前 言

中国近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惨、最具磨难之时，展开那血迹斑斑的历史画卷，硝烟挟着血腥味迎面扑来，屠刀伴着镣铐铿锵作响……。近百年来，由于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致使我锦绣山河破碎，人民备受欺凌。此一段挨打受辱的历史分明是压在中华民族心灵上的一块重石，在炎黄子孙的心里，每每撞击起感情的漩涡，压抑、痛苦、悲愤之情，激动着人民迫切要认识西方列强究竟是如何侵略、奴辱中国人民的。

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践踏过中华大地，都犯下过滔天罪行，都留下过累累恶迹。当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发展的不平衡，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华侵略中采取的政策、方略、手段、形式、后果也就不尽相同。法国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大国之一，在其殖民主义时代，法国在亚非拉许多地区都进行过殖民侵略，中国地大物博，市场广大，自然是法国殖民者虎视眈眈的重要目标。

早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法国就制定了以越南为殖民基地，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法兰西东方帝国”的侵略计划。他们认为，越南是其侵略中国最理想的跳板和军事基地，他们多次叫嚷说：“法国必须占领东京（当时西方称越南北部为东京），……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但是，由于法国资本主义早期发展不如英国，加上法国长期对外战争对其国力的影响，法国对华贸易、商品入侵远不如英国，通过

商业贸易掠夺中国财富、攫取在华利益、扩充其势力范围也相对较少，鉴于此，法国殖民者确立了主要通过扩张宗教势力进行对华侵略的战略方针。因此，在列强侵略中国的三种主要手段（洋教、洋货、洋枪）中，将洋教与洋枪交替使用最有效者当为法国侵略者莫属，法国传教士，作为“上帝的使者”手中挥舞的“福音书”与法国侵略军手中的“毛瑟枪”可谓珠联璧合，以致把欺骗与威胁反革命两手使用得淋漓尽致，使法国在中国获得了许多权益并开创了许多恶劣的讹诈先例。如：传教士在华公开传教的第一张通行证；第一个攫取铁路修筑权；第一个联合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共同绞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正义斗争；第一个获得不胜而胜的可耻的战争结果。……。就这样，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法国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多达55个。此外，还有与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合伙迫使中国订立的一系列条约，其中《北京条约》、《中法条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对中国侵夺最大、危害最深的条约。粗略计来，法国殖民者在中国强取了如下主要权益：

在政治、军事方面：强占广州湾，把中国西南发展成其势力范围；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主要城市强占“租界”；联合绞杀上海小刀会起义，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积极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从战争中获得大量权益。在经济方面：巨额战争赔款，仅《北京条约》和《辛丑条约》中，法国就攫取了白银79000000两；两次侵入北京，抢劫财物无数；资本输出，在华设厂6家，投资4595000元，银行借款，放高利贷，攫取部分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在文化教育方面：传教士像瘟疫一样涌向中国，渗透到中国城乡各地，1843年，罗马教皇任命法国传教士为北京教区主教，从此，“保教权”落入法国侵略者手中，传教士到中国来的政治侵略性都十分鲜明，相当部分人实际上只不过是

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用“使中国基督教化”的宗教语言，掩饰其征服中国的殖民主义野心，刺探、收集情报，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政治讹诈，挑动教民与非教民冲突，瓦解民族斗志。正是这些洋教士，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祸端横生、民无宁日的祸根。在教育方面：开办了各级教会学校，这些学校均严重破坏了中国教育的主权，其目的是为其侵略政策在中国的实施培养忠实奴才。

就这样，法国侵略者将洋教、洋枪、洋货多种侵略手段交替配合使用，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全方位地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企图实现其“法兰西东方帝国”的狂妄计划。

但是，法国侵略者建立“法兰西东方帝国”的企图终归是一种梦幻，当法国强盗的铁蹄践踏我国国土时，当洋教士罪恶之手伸向城乡各地欺诈、迫害、渔肉乡民，摧残幼童时，无数仁人志士与人民大众一道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爱国情怀，为救亡图存，为雪国耻家恨，进行了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斗争，他们在失败中求索，在弹烟血雨中奋进，挫败了包括法国帝国主义在内的列强企图瓜分、灭亡中国的罪恶阴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编写这本书，让后人共察法国侵略者在近代侵华罪恶活动中的几件主要事情，回顾中华民族曾走过的苦难历程，追忆一系列抗法斗争的历史意义，了解中华民族在近代被欺侮的原因，体悟探索国家和民族解放道路之艰辛，目的是为了以史为鉴，认清国情，为祖国永不再受欺侮，为中华之腾飞做好我们应作的工作。

目 录

前言

一、使中国“基督教化”

- 侵华势力的急先锋 (1)
- 第一张通行证 (6)
- 第一个法租界 (9)

二、“为保护圣教而战”

- 助清绞杀小刀会 (14)
- 为“保护圣教”而寻战 (18)
- 合伙打劫 (20)
- 明火执仗毁名园 (25)

三、“十字架”上的罪恶

- 文化侵略的大本营 (29)
- 第一个教案 (33)
- 南昌教案 (37)
- 拐虐幼童的基督徒 (41)

四、最大的一次较量

- 福州船厂的阴影 (46)
- “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 (50)
- 战云密布马江天 (54)
- 海盗式的屠杀 (57)
- “广西门户已不复存在” (60)
- 传教士与中法战争 (64)
- 可耻的不胜而胜 (67)
- 台湾是最好的“担保品” (71)

五、法国不甘落后

一、使中国“基督教化”

侵华势力的急先锋

在中国大地，人们曾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的佛教、道教寺观庙宇多处深山，正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而由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造的耶稣教堂、天主教堂却多立城镇，即各地政治、文化中心，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今天，教堂建筑或遗迹在中国仍然比城可见。自然，当年建造教堂的西方传教士们早已魂入“天国”，但那遗下的众多教堂却令人触景生情，那尖尖的屋顶，似乎表征着世人对上帝的崇敬与向往；那端端正正的十字架，更是充盈着虔诚、圣洁的气息。然而，后人更深刻的思问当是：西方传教士何以在近代中国贫弱之时，不远万里蜂涌中国？他们是传播福音与善道，救斯民于水火？还是带来灾难与卑劣，陷中华于深渊苦海？教堂是圣洁的殿堂，还是压在中国脊梁上的重石？

.....

让我们翻开中国近代历史长卷，去寻求确切的答案吧。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在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初年（公元 635 年），基督教的一支——聂斯多略派就由波斯传入中国，当时叫景教。唐朝时候，中国国力强盛，对于景教优容传展，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景教寺院，但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人信奉景教者不多，特别是唐武宗时，发布灭佛诏谕后，景教也被波及，不久绝迹。元朝时，基督教再次进入中国，但随着元朝的覆没，基督教在中国再次中绝。

然而从 16 世纪以后，西方基督教各派突然以前所未有的势头相继派遣传教士来华。当然，这时期，欧洲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海外交通贸易迅速增长，为传教士来华提供了条件，但是，传教士蜂涌来华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

1586 年，一份由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天主教主教以及各教派首脑共同拟定的“使中国基督教化——征服中国的计划”一书摆到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案前。计划建议从西班牙本土派一万或一万二千人，再雇用同样数目的日本人及菲律宾人，以实现征服中国的计划。计划着重指出：“不要像葡萄牙人那样，仅仅限于对中国海岸的劫掠，要统治中国，使中国基督教化。”可见，推动传教士蜂涌来华的真正动力乃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扩张、侵略的需要，基督教势力是为殖民侵略、扩张服务的，传教士们是搭乘殖民主义战车与商品、炮舰一起来华的，“上帝使者”与来福枪、商品三位一体，都是列强侵华的重要手段。而且，基督教的麻醉作用，特别是其充当侵略势力急先锋的作用更是其他手段无可比拟的。

在列强利用宗教侵华活动中，法国既是先锋又最为猖獗。近代法国是个国力仅次于英国的西方殖民者，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扫除了资本主义在本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但在长期的对外战争中其经济却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严重影响了法国的海外贸易。鸦片战争前，法国对华贸易就远远落在英、美等国之后，为了获取更多的在华利益，法国政府特别重视利用宗教作为侵华工具，妄图实现其征服中国，建立法兰西“东方帝国”的梦想。

法国很快将“使中国基督教化”的计划书付诸于实施，在国王路易十四亲自主持下，1698 年又有 10 名传教士在海军护卫

下乘坐海军“安得里底”号军舰，再次来华。开船前，路易十四专门发出训令：“搜集中国各处港口商埠及海岸的地图，了解各地的气候、风习、打听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并进行贸易试探，调查中法贸易的可能性与前景。”此后，在法国政府羽翼下的天主教迅速扩大其在华势力，他们打着传播“福音”的旗号，以“慈善事业”为掩护，积极从事各项非法活动。为了使传教活动在中国合法化，法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率先趁机发难，迫使清政府在中法《黄埔条约》中同意列强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为传教士来华活动打下了第一块基石，以后不到二十天，法国又迫使清政府正式废除了自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的禁教令。就这样，法国殖民者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取得了一条新的合法途径——借宣传宗教之名，行其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之实。法国当然在这条道上跑得最快。据计，到1870年止，法国在中国各大、中、小城市都设有天主教堂，南到海南岛，北到东三省、内蒙，东自滨海诸口，西到西藏、甘肃，法国传教士的足迹几乎遍涉中国城镇各地。

传教士何以能成为侵略势力的急先锋，这与传教士和殖民政治的特殊关系以及传教士极善伪装、欺诈的伎俩分不开的。传教士在从事侵略活动时，往往乔装打扮，披上美丽圣洁的外衣。他们自誉为“上帝的使者”，手捧“福音书”，讲着耶稣救苦救难的动人故事，满口“友善”、“仁慈”的话语，同时开办一些诸如医院、学校、育婴堂等所谓慈善事业，所有这些都是极具欺骗性的。以治病为例，由于西医、西药能较迅速地治疗某些疾病，传教士利用病人感激心理为突破口，不遗余力地向病人灌输基督教的“真谛”，说什么只要承认自己有罪并信仰耶稣，救世主就可以拯救一切。同时还召集病人做礼拜，感谢上帝，祈祷赐福，进而巧舌如簧地把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说成是上帝的“旨意”，是传播福

音的“功德”。如此掩盖、抹煞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而且人为地制造了教徒与非教徒间的摩擦，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使一些中国教徒产生了盲目崇洋的民族自卑感，极少数教徒甚至充当了侵略者的侵略工具。可见，传教士是利用医治少数中国人肉体痛苦为手段，行大肆贩卖精神毒素之实，正如传教士高德自供所言：“传教医生的工作和目的……既不是为着慈善而慈善，……他们无非是用治病为传教手段。”大批中国教徒就是这样被诱骗入教的。传教士陶斯威特曾在一份调查中说：“很多地方几乎所有的教徒，都是通过医院的媒介作用而信教的。”

除了宗教的欺骗活动外，传教士们还积极刺探和搜集情报，由谋划策，攫取中国权益，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讹诈，遇有机会便脱下法衣而出任公职，直接为殖民政治服务。起草《南京条约》中文稿的郭实那，鸦片战争前便在中国沿海进行过十次侦察活动。当他在吴淞口炮台刺探情报遇到清军拦阻时，就拿出基督教传教小册子散发，借此掩人耳目。他为鸦片商推销鸦片，受雇于香港英国殖民政府，为英国侵略军充当向导，协助英军司令官指挥作战，代表司令官在占领地区出安民告示，订立《南京条约》的谈判中又充当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的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像这样的传教士，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其目的还不是昭然若揭的吗！尽管他自己表白说：“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结合他的实际行为可见，他的“坚定信念”换成世俗语言，就是征服和奴役中国。

基督教与西方殖民政治的微妙关系和其在扩张侵略中的特

殊作用，自然得到各自政府的极大关注和精心扶植，法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经费除从法国教会获得部分接济外，主要依靠政府津贴。美国公使田贝对此有一段话则更露骨地表明了传教士与殖民政治的关系：“这些先锋队（传教士）所搜集的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以及一般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而传教士们自身当然更明白：“我等在中国的传教之人，与其说是由于宗教之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之原因。”

圣洁的外衣、慈善的话语终于不能掩盖血写的事实，随着列强侵华势力的不断深入和不平等条约的增多，在炮舰、毛瑟枪的支持下，传教士在中国的侵略活动越来越露骨和猖獗。他们在各地遍设教堂，广招教徒，勾结官府，土豪劣绅，地痞流氓，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恶势力。他们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甚至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如山东传教士就自称巡抚，命令中国官员服从教堂指示，保举媚外官员，包揽词讼，私设公堂，私征租税，有的甚至设立武装，肆意枪杀中国人民。1869年四川省西阳州法国天主教会就公然设置炮台，组织武装，以肢解、燃烛、轮奸等手段，屠杀了反抗教会暴行的中国民众百余人。

再说“育婴堂”、“孤儿院”等他们最津津乐道的“慈善事业”令人发指的兽行也一桩桩逐渐现形。1870年，在天津法国传教士办的“仁慈堂”里，仅仅几天，就有四十多名中国幼童被杀害，尸体被抛在乱葬岗上被野狗狂吠争食，景况令人惨不忍睹。其实，在育婴堂里，中国孩子常常是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经常遭受打骂等折磨，许多儿童无声无息地死去或被拐卖，上海圣母院育婴堂的婴孩死亡率高达95%，仅解放后在院内某一处基地挖出的婴儿骨骸就达八百多斤，侥幸活命的婴儿长到六、七岁时就被

强迫劳动，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双重折磨，成畸形发展……。

正直的人民公正地记下了当时人民对来华传教士的评价，美国人丹涅特说：“凡是乘坐横渡太平洋轮船的人民，一上船就没有不听到这句话，即‘传教士都是坏蛋’。他们来到中国，就是为着享受、为着抓钱。”当然，此话尚不能涵盖传教士的主要特征，更重要的是：传教士在列强侵华活动中，起到了商品、枪炮无法比拟的麻醉作用和先锋作用。

鲜血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随着传教士罪恶行径的不断暴露，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反洋教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第一张通行证

在法国贡比涅森林里，有一节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旧式火车车厢。那个看起来十分寻常的车厢与大森林美丽的自然景观似乎很不协调，但是，它在法国人心中，在法国历史上却有千钧份量。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击败了德国侵略者，1918年11月，德国政府就是在这节车厢里签下了投降书。可是，到了1940年6月，法国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法西斯击败，希特勒政府为了侮辱法国，迫使法国贝当政府还是在这节车厢里签下了丧权辱国的投降书。

如果说法国人没有理由可以忘却“贡比涅森林里那节火车车厢”的话，那么中国人又怎能忘却“阿吉默特”号法国军舰，1844年10月24日，就是在这条横行在中国广州湾的法国军舰上，法国政府强迫中国清政府签下了中法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法《黄埔条约》。

19世纪中晚期,那是中国大地血雨腥风,外敌列强群魔狂舞的黑暗岁月。1840年,英国首先发动对华“鸦片战争”,“天朝大国”不堪一击。1842年8月29日,在虎踞龙盘的石头城下,英国军舰大炮长伸,耀武扬威,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了近代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从此,神州大地“金锁铜关”大开,列强蜂涌而至,在虚弱的东方巨人身上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紧跟着,法国人也于1844年10月24日,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法国不费一兵一弹,竟然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攫取了英、美已经取得的各种特权,而且还攫取了一项新的重要权益,为西方传教士来华活动谋取了第一张通行证。

法国侵略者真是掠夺有术。

其实,法国在鸦片战争前与中国关系较为疏远,对华贸易也远远落在英、美之后,拿破仑政府因忙于欧洲战事,更是无力东顾。但是,鸦片战争爆发后,法国认为有利可图,开始特别关注中国事务。1842年,法国政府派真盛意来华,调查远东情势,从事侵华准备活动,《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的签订,英、美两国从中国获得了许多重大特权和巨大利益,更加深深地刺激了法国侵略者的贪欲,特别是《虎门条约》中有:“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语,暗示出:侵略者利益是相关的,应结成共同侵华的伙伴关系,更启示了法国侵略者明白:国际资本主义为扩充海上市场寻找殖民地的最佳途径已打开,法国不应该落后于人,一贯善于趁火打劫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开始了趁机向中国勒索的罪恶勾当。

1844年8月,法国政府派刺萼民率领8艘军舰远航中国,实施勒索计划。刺萼尼原是法国驻希腊公使,此人因外交手腕极

其狡猾，善于讹诈著称。刺萼尼来到澳门后没有急于行动，首先详细地研究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的内容，同时打探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虚实和对外态度。很快他摸清了清政府当时已陷入全面困境，尤其是惧外心理十分严重，当时有一则笑话云：一次清朝高级官员开会，有个官吏打了一声喷嚏，督抚等大多数官员以为是英军火箭来了，吓得赶紧往桌子底下钻。面对如此腐败无能的政府和官员，刺萼尼认为只要采取又打又拉的方法，一定可以迫使清政府就范。

清政府当时派往广州与刺萼尼交涉的是耆英，此人是一个典型的惧外投降派，他与外敌谈判的宗旨是所谓“一视同仁”的投降外交原则。刺萼尼这时对他已了如指掌，因此，八、九两个月他都按兵不动，坚不透露他这次来华的具体任务。把个耆英急得终日惶恐不安，只得派人到澳门去从旁打探。老谋深算的刺萼尼早料到耆英会这样做，于是故意到处放出空气，大造舆论：忽而传说法国要与中国结好，共同抗英；忽而又传说他将与中国为难，图据虎门；也有说他将要求清政府对天主教弛禁；又说他将率舰北上进京，进见皇帝。探报纷纭、莫衷一是，弄得耆英如坠九天云雾，大感困惑，这样，刺萼尼在谈判中已取得了完全的主动权，耆英则处于被动与焦急等待的地位。

十月初，刺萼尼见要挟的时机已经成熟，才开始与耆英正式谈判。根据耆英“一视同仁”的外交原则，刺萼尼援引了英、美先例，提出了订立商约的要求，昏庸老朽的耆英则认为“抚夷不外通商”，决不去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加之对法国虚实茫然无知，认为只要法军不打进北京就算办了交涉之事。因此，耆英很快同意了刺萼尼的要求，10月24日在广州附近的黄埔港“阿吉默特”号法国军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贸易章程》，即《黄埔条